

明朝晚期〈福建海防圖〉的繪製 及其時代背景*

陳宗仁**

摘 要

近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一幅明代海防地圖逐漸為外界所知，此圖除了描繪福建沿岸、近海島嶼，還包含遠洋島嶼：即北起琉球群島之那霸島，再南為臺灣島群，最南為呂宋島群。就明代海防地圖來看，這是首幅較詳細描繪上述三島群及其與福建相對位置的地圖，也是首幅記載上述三島群各港地名的地圖，是研究十六、十七世紀臺灣海域史的重要史料。

本文分析此圖的內容，並著重討論繪製年代，依據圖中寨、遊移設地點、年代等跡象，以及與福建巡撫黃承玄在 1616 年（萬曆 44 年）前後奏疏比較，認為此圖可能繪於 1616 年福建倭警頻傳之時；亦即村山等安派船出征高砂國的傳聞，迫使福建官方加強沿海武備，應是此圖繪製的原因與時機。

〈福建海防圖〉記錄了 1610 年代福建的海防部署，呈現當時福建官方對於閩海情勢的認知。此種描繪極富時代意義，不僅形象地呈現「東番諸山」的概念，亦隱喻著「海外別港」、「窮洋竟同閩市」的想法，傳達出各股商業勢力在前述島嶼群活動的訊息，顯露了 1610 年代臺灣周遭海域的商業與地緣政治情勢。

關鍵詞：海防、寨遊、福建巡撫、臺灣地圖、倭寇

*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明代〈福建海防圖〉的內容與繪製年代〉為題，於 2015 年 11 月 20 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寧波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主辦之「海洋印痕：海上絲綢之路與古代海洋地圖」學術研討會發表；撰稿過程中，感謝汪前進、孫靖國、龔纓晏、林天人、成一農等教授的協助與建議，亦感謝本刊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以及助理曾明德的協助。本項研究蒙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NSC-102-2410-H-001-037-MY2）補助。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稿日期：2016 年 3 月 3 日；通過刊登：2016 年 6 月 4 日。

- 一、地圖內容
 - 二、繪製年代的討論
 - 三、福建巡撫黃承玄籌畫海防與此圖之關係
 - 四、時代背景：〈福建海防圖〉的海市描繪
 - 五、結論
-

十七世紀初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兩度進佔澎湖，¹但兩次都被迫退出。一次是1604年8月（萬曆32年6月）韋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 1566 or 1570-1615）帶領的船隊，在與大明國福建官方談判數個月後，被迫退出澎湖。據福建官紳的說法，浯嶼把總沈有容（1557-1627）率船至澎湖，「諭退」了紅毛番。²第二次是1622年7月（天啟2年6月）雷爾生（Cornelis Reijersen）率船隊到澎湖，此次雙方對峙2年，或戰、或和，直至1624年8月（天啟4年7月）東印度公司決定放棄澎湖，船隊轉移至臺灣島的大員港。³

這兩次事件有一些共同性，如荷蘭東印度公司希望與大明國貿易，希望在鄰近大明國的海岸找到一個貿易據點，如澳門、澎湖。對福建官方而言，在這兩次事件中均要求荷蘭人退出澎湖，並且建議荷蘭人可以到臺灣海域，找尋一個合適的港口進行貿易。這種共同性似乎不是偶然巧合，何以在十七世紀初期澎湖對大明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雙方都很重要？何以福建的官員兩度都建議荷蘭人到臺灣海域來？甚至派人引導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到臺灣島勘察？⁴這些行為似乎不是

¹ 本文有關澎湖之「澎」字、遊擊與寨遊之「遊」字、湄洲之「洲」字，在行文中均作「澎」、「遊」、「洲」等字，引用之文獻有不同寫法，則依文獻用字，如「澎」字或作「彭」、「遊」字或作「遊」、「洲」字或作「州」。

² 何孟興，〈論明萬曆澎湖裁軍和「沈有容退荷事件」之關係〉，《臺灣文獻》62: 3（2011年9月），頁125-148；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關於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碑〉，收於村上直次郎等著、許賢瑤譯，《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頁187-203。

³ 楊彥杰，《荷據時代臺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6-32；林偉盛，〈荷蘭人據澎湖始末（1622-162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6（1999年5月），頁1-45。

⁴ 1604年韋麻郎佔領澎湖時，「向都司借了二、三艘戎克船及舵手赴東南、東南東，到高地探索適當之拋錨地」，參見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關於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碑〉，頁191-192。都司既願將船隻與舵手借與荷蘭人，且前往澎湖東方之陸地勘察，似亦可解釋為官員希望荷蘭人離開澎湖，前

少數官員的決策偏好，而是有其結構性與時代性因素，究竟當時福建官紳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如何看待澎湖群島、臺灣島？

有關十六世紀中葉以來明朝官方、海商、水手對於臺灣海域的認知，學界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如方豪《臺灣早期史綱》、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等論著有概論性的敘述，⁵何孟興之專著從明朝海防的角度分析澎湖的重要性與駐軍變化。⁶筆者則以當時臺灣的地名如「北港、雞籠、淡水、大員」等為論述核心，探討明朝官方、西班牙王國、荷蘭東印度公司對這些地域的認知與佔領經過。⁷上述研究大致釐清了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初期明朝官、商對於臺灣海域的認知及其變遷，亦探討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西班牙王國先後進佔臺灣的過程與原因。近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一幅明朝海防地圖逐漸為外界所知，此圖有關福建、臺灣海域的描繪增添了我們對十七世紀初閩海情勢的認識，值得探討。

這幅明朝地圖乃紙本彩繪，局部稍有破損，全長 580 公分，高 41 公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編號 26445，全圖未標註繪者、圖題。圖中描繪的地理範圍，中國大陸部分，北起浙江南端的南麂島，南至閩、粵交界的南澳島。遠洋島嶼則北起琉球群島之那霸島，再南為臺灣島，繪成群島狀，最南為呂宋島。描繪的重點是福建沿海各地的軍事設施與布防情形，亦呈現繪圖時福建官方對於臺灣周遭海域的觀察角度與地理認知。

1990 年代曹婉如等學者編纂的《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收錄此圖，曹氏稱此圖為〈福建海防圖〉，並撰文簡介，認為主要描繪福建沿海的山川形勢和設防情形，「為了防禦倭寇而繪製」，屬山水畫形式，不畫方格，文字註記均括以方框，府縣、巡檢司、衛所等均以城樓符號表示。繪製時間可能是明朝萬曆中、後

往東方之臺灣島。

⁵ 方豪，《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4）；周婉窈，〈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40（2007年12月），頁93-148。

⁶ 何孟興，《海中孤軍：明代澎湖兵防研究論文集》（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2）。

⁷ 參見陳宗仁，〈「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21: 2（2003年12月），頁249-278；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陳宗仁，〈明朝文獻中「雞籠」與「淡水」地名的出現及其背景：兼論十六世紀下半葉北臺灣情勢的轉變〉，收於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主編，《海洋文化論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0），頁225-254；陳宗仁，〈1622年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東亞貿易策略的轉變：兼論荷蘭文獻中的Lamang傳聞〉，《臺大歷史學報》35（2005年6月），頁283-308。

期(1597-1619)。⁸書中刊出全圖三個局部圖面，分別是琉球王國，澎湖及閩、廣交界，但琉球王國的局部圖面，其圖說誤謂是臺灣島。

2011年姜勇、孫靖國發表〈福建海防圖初探〉，對此圖有更詳細的描述與研究，謂此圖原為經折裝，每幅41×21.5cm，後改為卷裝。作者大量抄錄圖中文字註記，並作說明，頗便學者研究。關於繪製年代，則推測是在1597-1604年(萬曆25-32年)之間；認為此圖是表現「明廷在消弭倭患之後，在福建沿海地區的軍事布防態勢」。⁹2012年孫靖國編撰的《輿圖指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亦收錄此圖，有圖說一篇，對此圖繪製年代和介紹大致與上文相同，¹⁰另以7頁篇幅刊出大部分圖面，雖然未收琉球與澎湖兩區域之圖，¹¹但已相當便利學界研究。

就明朝海防地圖來看，〈福建海防圖〉是首幅較詳細繪出琉球、臺灣、呂宋三島群及其與福建相對位置的地圖，也是首幅詳細記載上述三島群各港地名的地圖，顯露當時明朝官方對上述三島群的地理認知，是研究十六、十七世紀臺灣周遭海域的重要研究史料。本文擬探討此圖之內容特點、繪製年代及其時代背景，而此圖繪製年代是最關鍵的問題，¹²若能確認年代，我們可以明瞭某個時期福建的海防布置，也可得知當時福建官方對琉球——呂宋島群的地理認知狀態。

一、地圖內容

此圖對於福建海岸的描繪順序是由右向左，從閩、粵交界向北至閩、浙交界。這是明朝各種海防圖常見的描繪方式，即從廣東、福建往北畫。其內容可分以下三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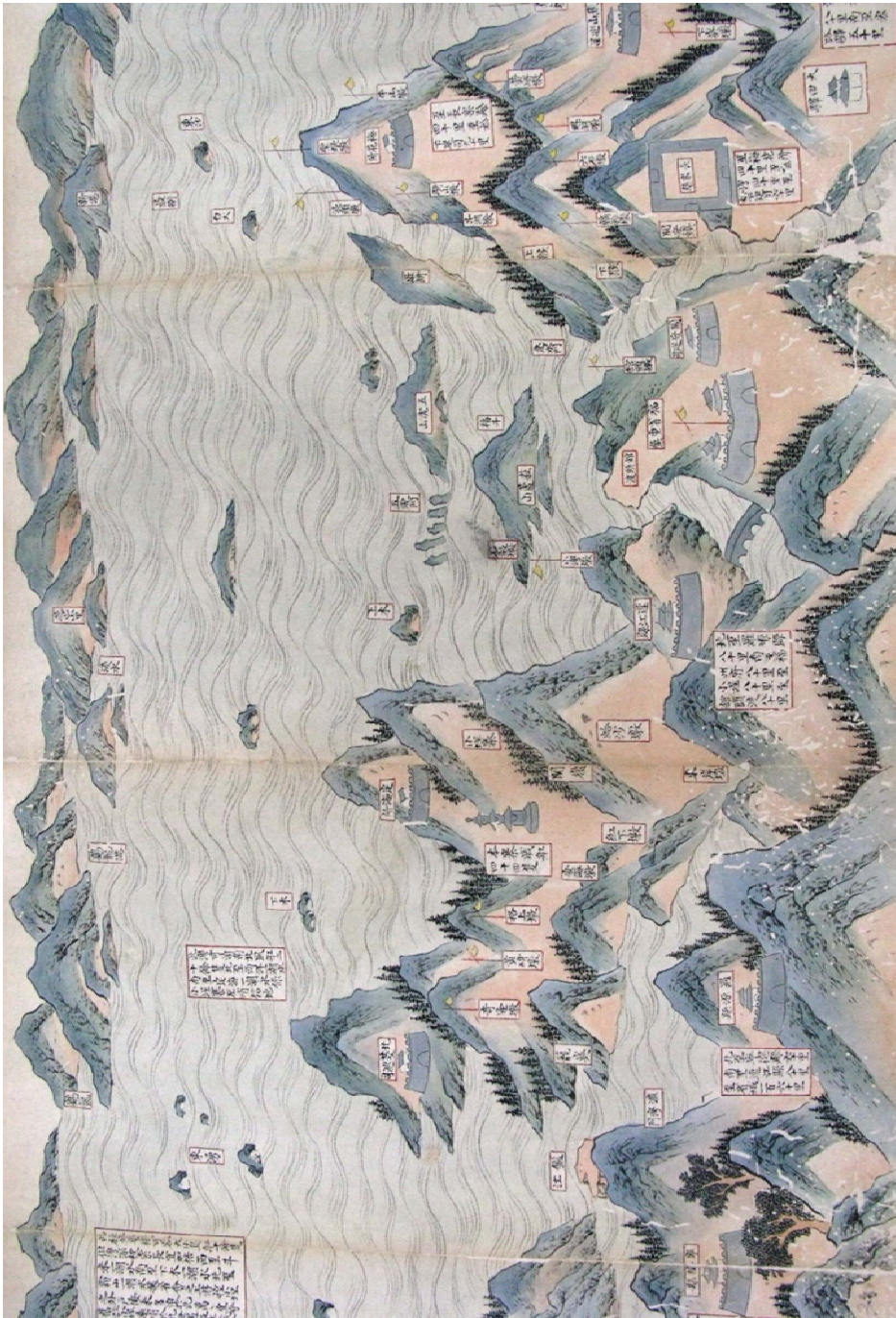
⁸ 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頁5。

⁹ 姜勇、孫靖國，〈〈福建海防圖〉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1，頁67-72、158-159。〔按：中國期刊無卷期而以年份標示者，不另列出版年，以下同〕。

¹⁰ 孫靖國，《輿圖指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頁324-326。

¹¹ 孫靖國，《輿圖指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頁327-333。

¹² 明清時期地圖的繪製可能存在多次的繪本，如繪製過程中的稿本、完稿後的清稿本、傳抄本。由於史料有限，筆者無法判斷現存〈福建海防圖〉究屬稿本或他人抄本，本文所指「繪製年代」係指圖幅內容顯露的年代。



圖一 〈福建海防圖〉雞籠、淡水局部

資料來源：孫靖國，《輿圖指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12），頁 327-333。以下地圖圖像均出自於此，不再贅述。

(一) 形勢的描繪

閱圖的角度是從陸地向海洋瞭望，繪者希望表達福建官方對沿海的觀察與軍事部署，至於實際方位、比例的準確性及實際遠近距離，均非此圖之重點。以下分述此圖之內容：

本圖地形的描繪大致可以區分為三類：

1、沿岸灣澳及島嶼：如同安縣有石澗灣，晉江縣有石湖灣，湄洲島有金沙灣。在廈門灣則繪有廈門島、金門島、烈嶼等島嶼。

2、近海島嶼：如閩、浙交界的南麂，以及與福建沿海各府縣相對的崑山、臺山、東湧、海壇、南日、湄洲、澎湖、南澳等島。

3、遠方島嶼：琉球國、臺灣海域的島嶼群、呂宋島群。

1560年代《籌海圖編》之〈沿海山沙圖〉較重視沿岸灣澳及島嶼的描繪，對於近海島嶼則僅標註島名，但〈福建海防圖〉與之相較，則重視離岸較遠的島嶼與更遠方的島嶼。如何看待〈福建海防圖〉這種圖像表現方式？1596年（萬曆24年）浙江巡撫劉元霖條議海防的奏疏中，主張要「靖海島以絕孽端」，謂：「海中山巒錯列，林木蒙翳，亡命姦徒易於盤據，如……溫州之南麂、東洛等山俱稱沃壤，外逼島夷」。¹³文中提到南麂，亦見於〈福建海防圖〉。依據劉元霖的描述，南麂之類的島嶼，錯列海中，姦徒易於盤據，他主張禁絕開墾，以免島上住民與倭夷勾結。他對海中山巒的看法有助於理解〈福建海防圖〉的繪製方式，即圖中遠方島嶼如琉球、臺灣、呂宋各島，對十六、十七世紀之際的明朝官員而言，那是島夷所居之地，也是倭寇活動的範圍。至於近海島嶼則是界於島夷地界與明朝府縣之間，既有民人前往開墾、住居，又可能是倭夷勾結、駐泊之地，故要「靖海島以絕孽端」。有些福建官員亦認為這些近海島嶼是在「門庭之內」，如1617年（萬曆45年）福建海道副使韓仲雍即謂：

汝〔按：指倭寇〕來西販，先經浙境，乃天朝之首藩也。迤南而為臺山、為礮山、為東湧、為烏坵、為澎湖、為彭山，皆是我閩門庭之內，豈容汝涉一跡！此外溟渤，華夷所共。¹⁴

¹³ 范涑，《兩浙海防類考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531。

¹⁴ 黃承玄，〈題報倭船疏〉，收於黃承玄，《盟鷗堂集》（東京：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会社，

因此，〈福建海防圖〉所繪島嶼、海岸並非僅是地理上的客觀描述，對於當時的官員而言，遠洋島嶼是島夷所居，而近海島嶼則屬門庭之內，地方安危所繫。1597年明朝兵部官員李禎在議論防倭方略時，提到要「聯海岸、島洋形勢以捍狡襲」，¹⁵ 他所論非專指福建海防，但筆者認為其看法十分貼切〈福建海防圖〉繪製的主旨，即聯結海岸、島洋的形勢，其目的是要「捍狡襲」。

（二）地名、官署名的註記

學者們認為這是一幅海防圖，而非行政區圖或海圖，主因是圖中地名多為官署名稱，且與海防部署有關，因此，應從福建海防部署的角度來分析此圖之地名與圖說。在此圖中，長樂縣與連江縣之間繪有一處城牆建築，註記「福省重鎮」（圖一），此即福建最重要的城市福州府所在，福建巡撫與福建總兵平日駐於此城。春冬汛期時，福建總兵前往沿海衛所駐紮，圖中海壇島左下方註記「鎮東衙」、「督府出汛鎮此」（圖五）。鎮東衙應為鎮東衛之誤，該衛在今福建省福清縣，面臨福清灣。督府應指福建總兵，「出汛鎮此」指總兵於汛期駐節於鎮東衛。另外，此圖在莆田縣平海衛位置標註「南日出巡總兵衙署」（圖三），意即總兵出巡時，駐節於平海衛。福建總兵自1563年（嘉靖42年）設立後，春、秋二季駐福州省城，與福建巡撫同城，夏、冬二季駐鎮東衛。¹⁶ 1592年（萬曆20年）豐臣秀吉出兵朝鮮，隔年，福建巡撫許孚遠奏請福建總兵常駐鎮東衛，因該地「居福州之東南貳百里，而近前接竿塘、五虎，為倭寇入省之衝，總兵居重馭輕，固宜駐鎮東以蔽全省之門戶」。¹⁷ 1597年（萬曆25年）福建巡撫金學曾又奏請「福建總兵原駐鎮東……于有警時移劄定海，以便水陸堵截」。¹⁸ 依據此圖所繪，汛期時，福建總兵駐於鎮東衛，出巡時則駐平海衛。

1991），卷2，頁33b。

¹⁵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卷314，頁5879，萬曆25年9月29日條。

¹⁶ 何喬遠撰，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閩書》校點組校點，《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1995），頁983。

¹⁷ 許孚遠，《議處海防疏》，《敬和堂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22年[1594]序刊本），卷6，頁3a-b。

¹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312，頁5842-5843，萬曆25年7月16日條。

在〈福建海防圖〉中，繪者以文字說明與較大圖示呈現總兵駐節地點，顯示其為繪者欲突顯的重點。另外，此圖中各處布滿城牆的描繪，代表各類官署的位置；其中又有一類圖示是城牆較長，城上有兩座城樓，這類地點亦與海防、武備官署有關，由北而南分述如下：

1、福寧州城：圖中此處有文字標註：「福寧州、分巡道、福寧衛、參將府」，其旁有「左土營、右土營、前浙營」等。其中參將府即分守北路參將府署，分巡道指分巡建南道，¹⁹左、右土營與前浙營屬北路參將標下營兵。

2、興化府城：圖中此處有文字標註：「分守道、莆田縣、興化府、遊擊府、興化衛」，遊擊府即分守中路遊擊府署，其旁標註「前浙營、左浙營」，為中路遊擊標下營兵。分守道乃分守福寧道，1559年（嘉靖38年）設。²⁰

3、泉州府城：圖中此處有文字標註：「興衛道、泉州、泉州府、晉江縣」。此段文字有誤，應為「興泉道、泉州衛、泉州府、晉江縣」。此處武備只有泉州衛，未設參將或遊擊，但有分巡興泉道駐此，亦設於1559年。²¹

4、漳州府城：圖中此處有文字標註：「漳南道、龍溪縣、漳州府、參將府」，參將府即分守南路參將府署，參將標下有3營，其中一營即其旁標註「漳州浙營」，²²另有標下二營，即圖中海澄縣、陸鰲所兩處分別標註「海澄營」、「陸鰲營」。至於「漳南道」則指分守漳南道，設於1581年（萬曆9年）。²³

上述四處地名、官署名均有較大的圖示呈現，除泉州府城外，另三處府、州城分別有參將、遊擊駐防。明朝萬曆年間福建海防武備分為北、中、南三路，各設參將或遊擊分守，在此圖中均見明顯標註。另外，上述四府、州城均設道員，

¹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80，頁1712，萬曆6年10月9日丙戌條。

²⁰ 唐大和纂，《興化府志》（東京：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会社，1988），〈建置上〉，頁11a-b載：「因倭寇作，議者謂福興漳泉濱海之地非彈壓以大吏不可，始奏特設布政司左參政一員，駐鎮興化城」。

²¹ 徐敏學、吳維新纂，《萬曆重修泉州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卷4，頁339載：「〔按：嘉靖〕三十八年倭入寇，郡邑多事，廼分福寧道備兵福州，駐省城，改本道為興泉道，備兵興泉，泉有專道自此始」。

²² 閔夢得修，《萬曆癸丑漳州府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頁1056-1057載：「府城外浙兵營始於萬曆十一年……見存五百七十五員名」。

²³ 閔夢得修，《萬曆癸丑漳州府志》，頁712載：「萬曆間〔按：因海道由漳州移駐會城〕……漳州奏請特設分守漳南道，自是而率屬與治，蒞兵、撫民、守巡，竝主其權」。首任是范謙，萬曆9年任，參見閔夢得修，《萬曆癸丑漳州府志》，頁723。

如興泉道、漳南道，與參將、遊擊同城，此即福建巡撫黃承玄所謂：「諸路則參、遊統督，而道臣監之」之意。²⁴

除上述文字標註外，〈福建海防圖〉標註的地名、官署名亦大多與海防有關，以漳州府為例，條列如下：

1、文職之縣衙名：海澄縣、龍溪縣、漳浦縣、詔安縣等。

2、武職之衛、所、營名：漳州衛、鎮海衛、陸鰲所、銅山所、玄鍾所、漳州浙營、海澄營、陸鰲營等。

3、巡檢司名：井尾（澳）巡司、島尾巡司、濠門巡司、柳營（江）巡司、海澄巡司……等。

4、墩名：月港墩、海滄墩、卓崎墩、小灣墩、流會墩……等。

5、驛名：雲霄驛、江東驛。

6、寨、遊名：銅山寨、南澳遊。

7、山、澳、島名：梅州山、走馬溪、東平渡、境山……等。

在〈福建海防圖〉中，上述地名、官署名如參將官署、府州縣衙、衛所、寨遊、巡司及墩臺等，均與海防武備有關，呈現的是整體福建海防體系。

（三）圖說

〈福建海防圖〉中，除地名、官署名外，亦有較長的文字說明，其內容均與海防有關，主要有以下三項：

1、陸路各官衙、驛遞間的距離：如詔安縣，「北至雲霄驛一百里、至玄鍾所二十里」，又如雲霄驛「北至漳浦縣一百里、南至詔安縣一百里」。

2、防汛信地之說明：以澎湖遊為例，在圖中今澎湖群島附近標註「此係澎湖遊右哨信地，北風守蒔內，南風移泊風櫃仔」、「左哨，北風守獅嶼頭，南風移泊大菓葉防守」。又如各信地之航行距離與各港澳可泊船數：如福寧州海外之官澳山，「此澳可泊南北風船數十隻，東至臺山一潮水，北至南甌一潮水，南至鎮下門一潮水，烽火寨前哨信地」。

3、外島介紹：以澎湖群島為例，圖中文字標註共二百餘字，為便於討論，

²⁴ 黃承玄，〈條議海防事宜疏〉，收於黃承玄，《盟鷗堂集》，卷2，頁14a。

全文引述如下：

按澎湖，環山而列者三十六島，蓋巨浸中一形勝也。山週圍四百餘里，其中可容千艘。

我守之以制倭，倭據之以擾我，此必爭之地。前後建議，籌之詳矣。近因官兵遠涉，藉口風時不順，躲泊別處。或謂議當建城，又慮大費，遂寢其謀也。然要在將令得人，則兵不患其偷安，城之有無可毋論矣。

惟是延袤恢野，向來議守，委而棄之。既設遊屯兵防禦，可惜山地廣闊，若能開墾，則田有收，厚利有實。倘有賢能把守，募沿海漁民為兵守汛，畫地分疆，舊基興作，倡人開墾，三年之外，計畝量收其三分之一，行有成效，則置兵墾田，相資而食，共守險地，兩者俱得之矣。

原文未分段，按其文意，筆者試為分作三段。首段寫澎湖形勢，次段是籌防議論，繪者認為不必建城，派兵守汛即可；末段則建議置兵墾田。

又如閩浙交界之南麂山，其圖說載：

此山生在海上，西至官灣一潮水，南至臺山一潮水，為浙之外藩，閩之上遊，居兩省之交。倭來多從此取水，為要地。

前議設副總兵屯駐，策應福、浙，經福建巡撫金 題，未覆，亦以承平日久，事乃寢焉。萬一倭寇突來中國，此地斷不可棄守。

無如宿將屯兵，為兩省犄角；北急則北援，南急則南援，勢若常山，豈非至計？……加意閩海者，不可不預之圖也。

此段圖說的寫作格式亦如澎湖圖說，首段敘南麂形勢，次段論戰守，末段則是繪者的建議。

此圖有關外島的介紹均有較詳的圖說，除前述澎湖、南麂之外，尚可見之於臺山、崙山、東湧、海壇山、南日山、湄洲山、浯嶼、南澳等處。關於這些島嶼的介紹，除了記載各自形勢與島嶼間的相對距離外，繪者特別強調戰守的議論。當時防禦之敵人當然是指倭寇，如前述澎湖群島，繪者謂：「我守之以制倭，倭據之以擾我」；而更重要的是繪者會提出自己的守防建議，如圖中「倘有賢能把

守」、「無如宿將屯兵」、「加意閩海者」之類用語。上述圖說表明繪者似乎對福建海防的歷史與現況頗為熟悉，故能敘述多處閩海外島之形勢、先前之戰守議論及其守防建議。明朝嘉靖至萬曆年間，很多浙、閩官員撰文、編書議論海防，如鄭若曾之《籌海圖編》，其書名直接標示「籌海」，謝杰之《虔臺倭纂》有〈倭議〉一章，范涑《兩浙海防類考續編》多處提到「尚俟後之籌海者酌而行之」、「任海防之責者不可不講也」。²⁵ 因此，〈福建海防圖〉作者之繪圖構想其實與上述海防著作之作者相同，均是籌議海防事宜，不同處是大多數作者以書籍形式記載海防實況與備倭議論，而該圖則是以地圖形式表達其對福建海防現況的描述與議論，也許繪者即為福建海防官員、幕僚，或與海防官員親近之士紳。

此圖原無圖名，曹婉如稱之〈福建海防圖〉，嘉靖時期浙直總督胡宗憲謂：「防海之制，謂之海防」。²⁶ 江防、海防乃當時官方用語，故此圖稱〈福建海防圖〉，符合此圖描繪之內容、重點。

二、繪製年代的討論

〈福建海防圖〉描繪某一時期的海防武備，亦有官員的海防議論，然而此圖究竟繪於何時？曹婉如認為此圖繪製時間可能是明朝萬曆中、後期（1597-1619），其看法主要依據圖中提到兩個年分，即在崙山遊的文字註記「萬曆二十年改北路守備為參將」、在臺山島註記「萬曆二十五年設遊擊」，由於圖中有「萬曆二十五年」之年代，故其繪製當在此年（1597）之後。至於何以繪製年代下限是 1619 年（萬曆 47 年），則未說明。姜勇、孫靖國等學者認為從 1604 年開始，「荷蘭多次侵擾澎湖，但圖中並未提及此事」，推測此圖繪製時間當在 1604 年，即荷蘭東印度公司韋麻郎司令率領船隊至澎湖之時。

上述學者對此圖的見解提供一個良好的研究基礎，使我們可以對此圖內容與繪製年代作更進一步的討論。以下依據圖中對於寨、遊的駐泊位置來推斷繪圖年代。

²⁵ 范涑，《兩浙海防類考續編》，頁 543、535。

²⁶ 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12，頁 763。

(一) 1602年浯嶼寨移至石湖

明朝官方在福建先後設置 5 個水寨，其中明初在漳、泉兩府沿海設立一處水寨，由於地點在廈門灣南側的浯嶼，即稱「浯嶼寨」或「浯嶼水寨」。²⁷ 但此圖中，浯嶼寨繪於泉州灣南側的石湖（參見圖二）。《泉州府志》載：「浯嶼在縣極南，孤懸大海中，左達金門，右臨岐尾，水道四通，為漳州海澄、泉州同安二邑門戶。明洪武初置水寨於此，景泰三年尚書薛希璉經略海上，以其地孤遠，奏移之」。²⁸ 意即 1452 年（景泰 3 年）以後，浯嶼水寨遷往廈門，名稱依舊。²⁹

到了 1602 年（萬曆 30 年），福建官方將水寨從廈門移至石湖，石湖今屬福建省石獅市蚶江鎮石湖村，石湖左側的蚶江即清代與臺灣鹿港對渡之港口。美國



圖二 〈福建海防圖〉浯嶼寨局部

²⁷ 周凱，《廈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95 種，1961；1832 年原刊），頁 80 載：「〔洪武 21、1388〕江夏侯周德興於沿海要害處置巡檢司十八，復於大擔、南太武山外置浯嶼寨，控泉郡南境，撥永寧、福全衛所兵二千二百四十二人，合漳州衛兵，共二千八百九十八名戍之，統以指揮一員，謂之把總」。

²⁸ 懷蔭布修、黃任等纂，《泉州府志》（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64），卷 25，頁 22a。

²⁹ 浯嶼水寨從浯嶼遷往廈門的年代並不清楚，1489 年刊《八閩通志》記載已移至廈門，故移防之時間大約在 1452 至 1489 年間，相關論述參見何孟興，《浯嶼水寨：一個明代閩海水師重鎮的觀察》（臺北：蘭臺出版社，2006），頁 157-191。

國會圖書館典藏的《泉州府輿地圖說》繪於十七世紀初，書中〈晉江縣圖說〉記載移寨石湖的過程，謂：「近蒙程知府請移浯嶼水寨于石湖，北仰崇武，南瞰料羅，居中調度，既得臂指之勢，益張門戶之固矣」。³⁰程知府即泉州知府程達，1601年（萬曆29年）任職。葉向高所寫〈改建浯嶼水寨碑〉亦詳載此事，謂：「役始於萬曆壬寅年〔按：萬曆30年，1602年〕六月廿二日，竣於癸卯年〔按：萬曆31年，1603年〕二月二十日」。³¹

由於此圖中浯嶼寨繪於石湖，故知繪製時間必在移寨之後，即晚於1603年。

（二）1606年始設湄洲遊

〈福建海防圖〉中湄洲山的位置，有文字註記：

按湄州原係南日後哨信地，其起在海上賊灣，為盜賊出入之區。又處南口〔按：日〕、浯嶼之除〔按：際〕。如地方失事，兩相諉推，此湄州道〔按：遊〕之所以設，即今標衝遊是也。

按湄洲道應為湄洲遊之誤。文獻所載湄洲遊設置時間並不一致，《閩書》載「隆慶初，設游兵於此」。³²萬曆刻本（1613年修）《福州府志》載：「萬曆初，尋增南灣、崙山、湄洲三遊」。³³但1592年刊行之《籌海重編》記載五寨三遊，三遊乃海壇、玄鍾及浯銅，而未見湄洲遊。³⁴故隆慶初或萬曆初（1560、1570年代）均尚未設立湄洲遊。

1632年（崇禎5年）福建出身的官員王家彥謂1596年福建巡撫金學曾添設崙山、海壇、湄洲、浯銅、玄鍾、礮山、臺山、澎湖諸遊。³⁵但王家彥之說法可疑，因崙山遊設立於1592年，臺山遊設立於1600年（萬曆28年），³⁶設立時間

³⁰ 林天人編撰，《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2013），頁284、286。

³¹ 沈有容輯，《閩海贈言》（文叢第56種，1959；1602年原刊），頁4-6。

³² 何喬遠撰，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閩書》校點組校點，《閩書》，頁988。

³³ 林材纂，《福州府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頁177。

³⁴ 鄭若曾撰、鄧鐘重輯，《籌海重編》（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頁70-71。

³⁵ 汪楫編，《崇禎長編》，收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黃彰健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附錄，卷63，頁3664-3665，崇禎5年9月20日條。

³⁶ 朱梅等纂，《福寧州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卷6，頁2a、32a。

均非 1596 年，故王家彥謂金學曾設立諸遊，可能只是約略之辭。

曹學佺《石倉文集·湘西紀行》載：「萬曆三十四年〔按：1606〕冬，割大岞以北、文甲門以南為湄洲遊，總用名色，分南日軍兵船隻之半，另設二哨官……」，對湄洲遊的設置過程描述相當詳盡，³⁷ 此說似較可信，若湄洲遊成立於 1606 年，則此圖繪製年代必在該年之後。

（三）1610 年之後南日寨移至劉澳

南日寨原設於南日山，此島位在今福建省莆田市外海，興化灣東南側，故寨稱「南日寨」。其後水寨移至吉了巡檢司，名稱未改。³⁸ 吉了巡檢司在湄洲灣東側之忠門半島西岸。水寨移此，以官方海防部署的角度看，係從守護興化灣改為重視湄洲灣的防備。十六世紀下半葉，南日寨船隻均泊於吉了澳。如 1575 年（萬曆 3 年）唐大和纂《興化府志》謂：「〔按：南日寨〕今在莆田縣新安里吉了澳」。³⁹ 1580 年代福建提學副使王世懋親至其地，謂：「吉了多山，戰艦可泊，民居稍稠，南日寨以收汛時託焉。余行海上按視，城壘殿最……頗稱偉觀」。⁴⁰

到了 1590 年代，水寨位置似有改變，如《籌海重編》之圖，南日寨繪於吉了巡司，但另有一南日新寨，位在海衛附近。《虔臺倭纂》之圖亦同。⁴¹ 在〈福建海防圖〉中，原吉了巡司的位置，標註湄洲遊駐泊。此圖中南日寨出現兩處，一在莆禧所南側，有一小灣，標註「南日寨」。另外在興化灣南側亦標註「南日寨」，並註記「本寨大小戰舡四十六隻」，後者應是繪圖當時南日寨船隻駐泊地，旁有一地名「劉澳」。換言之，在〈福建海防圖〉繪製之時，南日寨已移至劉澳。關於此事，似與當時興化府海防同知汪懋功的建議有關。

³⁷ 曹學佺，《曹能始先生石倉全集》（東京：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会社，1993），第 21 冊：石倉文集·湘西紀行，下卷，頁 27a-27b。除本文上述引用之文字外，曹學佺另謂：「不過百里，必用一色總者，以前哨之金沙澳潮退闊淺，不便拋泊，山與塢坵對峙，倭奴登犯……故汛地雖狹而關防最為喫緊」。

³⁸ 嘉靖時期《鄭開陽雜著》卷 8 所繪之圖，其圖說謂：「南日水寨原設於海中南日山，北逼南茭、湖井之衝，南阻湄洲、岱嶼之阨，最為要害。今遷之，致寄番泊，宜遷之」。參見鄭若曾撰，《鄭開陽雜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8，頁 3b。

³⁹ 唐大和纂，《興化府志》，〈建置上〉，頁 49b-50a。

⁴⁰ 王世懋，《閩部疏》（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頁 58。

⁴¹ 鄭若曾撰、鄧鍾重輯，《籌海重編》，頁 19；謝杰撰，《虔臺倭纂》（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5），頁 141-142。

據汪懋功〈條陳南日寨兵船以泊劉灣及南區畫南日山事宜〉謂：

唯收汛時，寨、遊之船盡入泊吉了內澳……合無於汛畢之時，將湄州遊兵船原泊吉了，以南日寨船撤泊三江。

今復親履其地，遍覽形勢，去三江不遠曰劉灣者，四山藩蔽又且寬廣，更善于三江，昔戚總戎曾泊船於此，矧在三江口外，為南日右哨信地。沉南日前哨苦嶼去此僅二潮八，左哨萬安去此僅一潮水，右哨南日山西寨去此止半潮水，後哨平海亦一潮水，居中四達，隨發隨至，孰與遠停吉了之阻哉。⁴²

南日寨由吉了移至劉灣，其實是不得不然的作法，亦即南日寨移至吉了，守護湄洲灣，但到了萬曆年間（可能是 1606 年之時），官方又設立湄洲遊，等於兩支船隊於收汛後同駐泊於吉了，故海防同知汪懋功才會建議南日寨船隻應北移至興化灣駐泊。他親履其地，建議泊於離三江口不遠的劉灣。

在〈福建海防圖〉中，南日寨船隻駐泊於劉灣，故知此圖繪製時間應在汪懋功條陳之後。汪氏於 1610 年（萬曆 38 年）任興化府海防同知，其後任沈之鏊於 1616 年（萬曆 44 年）接任，⁴³ 故知此圖繪製應在 1610 年以後。

三、福建巡撫黃承玄籌畫海防與此圖之關係

依據福建相關寨、遊的位置與沿革，筆者認為〈福建海防圖〉繪製年代應在 1610 年以後。值得注意的是，此圖有關湄洲遊的解說中謂：「此湄州道（遊）之所以設，即今標衝遊是也」，意即繪圖之時，湄洲遊已改為標衝遊；此外，在海壇遊之北，又有文字註記「標遊信地」。關於標衝遊、標遊的設立，應與 1616 年福建巡撫黃承玄籌劃、調整福建海防體制有關。

明朝在東南沿海設立衛所，置舟師出海巡邏，其年代可追溯至明初，福建沿海亦先後設立烽火門、小埕、南日山、浯嶼、銅山等五寨。到了十六世紀中葉，

⁴² 宋若霖等纂、宮兆麟等修，《莆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頁 300-301。〔按：三江口位於今福建省莆田市東南海岸，木蘭溪自仙游縣東流，經此入海〕。

⁴³ 宋若霖等纂、宮兆麟修，《莆田縣志》，頁 228 載：「汪懋功乃歙縣人，1610 年任，繼任者為沈之鏊，1616 年任」。

沿海各省因倭亂而加強海上軍事力量，1564年（嘉靖43年）福建巡撫譚綸重建海防體制，釐訂沿海五寨員額、職責，如每寨設兵船40隻，各分信地，建立會哨之制。到了隆慶、萬曆年間又因戰防需要，先後設立海壇、玄鍾及浯銅等三遊，又再增設臺山、崙山、湄洲、澎湖等四遊，⁴⁴到了萬曆晚期，即1610年代時，整個福建海防共設置五寨、七遊。但1616年時，因日本船隊侵襲臺灣的傳聞，迫使福建巡撫黃承玄加強海防部署，由於當時寨、遊的更動與〈福建海防圖〉所載相仿，故本節討論黃承玄的海防部署與該圖之關係。

黃承玄，浙江省秀水縣人，1586年（萬曆14年）進士，初授工部主事，後於各省任官，1615年（萬曆43年）由應天府尹陞為福建巡撫。⁴⁵同年，日本德川幕府發給長崎代官村山等安（?-1619）前往「高砂國」的朱印狀，隔年（1616）村山等安命其子村山秋安率領船隊前往臺灣。由於村山等安取得朱印狀後，歷經半年多的時間備辦船隻、人員，此一舉動受到外界注目與猜疑，琉球國王尚寧得知此消息，於1616年派通事告知福建官方，謂：

通聞倭寇造戰船五百餘隻，本年三月內協取雞籠山等處，竊思雞籠山雖是外島野夷，其咽喉門戶，有關閩海居地，藉令肆虐雞籠，則福省之濱海居民焉能安堵如故。⁴⁶

此一消息震驚福建官紳，福州士紳董應舉（1557-1639）此時告歸在里，他認為近二、三十年來，日本「前殘朝鮮、又收琉球、又志鷄籠」，復謂日本「垂涎鷄籠，志不在小，或收雞籠以迫我，或借雞籠以襲我，無但曰彼志通商，逆風假息而已」。⁴⁷董氏在〈籌倭管見〉一文更謂「鷄籠去閩僅三日，倭得鷄籠，則閩患不可測」。⁴⁸當時福建巡撫黃承玄獲此情報後，亦認為倭寇未必只是攻取雞籠，有可能乘風侵犯福建沿岸。他研判倭寇的威脅在於「指臺、礮以犯福寧，則閩之上游危；越東湧以趨五虎，則閩之門戶危；薄澎湖以瞰泉、漳，則閩之右臂危」，於

⁴⁴ 黃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與遊兵：浙閩粵沿海島嶼防衛的建置與解體》（宜蘭：學書獎助基金，2001），頁11-32、85-107。

⁴⁵ 其傳記參見屠本仁纂，《嘉興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頁42b-43a。

⁴⁶ 黃承玄，《題琉球咨報倭情疏》，收於黃承玄，《盟鷗堂集》，卷1，頁17b。

⁴⁷ 董應舉，《答韓壁老海道》，收於董應舉，《崇相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525-526。

⁴⁸ 董應舉，《籌倭管見》，收於董應舉，《崇相集》，頁190。

是先從福建南、中二路各徵調 10 艘兵船協防福建北路，並向皇帝奏報〈題琉球咨報倭情疏〉，謂：「今日備倭之策，凡臣所得為者，容臣次第條畫上請」，⁴⁹ 意即黃承玄正在規劃備倭策略。約隔兩、三個月後，黃承玄依據帶管分巡福寧道右布政使黃琮、糧餉道參政畢懋良、巡海道副使韓仲雍等屬官提出的建議，加上自己多方採訪，上呈〈條議海防事宜疏〉，其中謂：「海氛多警，飭備宜嚴，敬陳防守事宜」，提出「有關經制錢糧、裁設將領及諸因革事宜相應題請者，謹條為八款，據實上聞」。⁵⁰ 八款提議與本文關係最大者為第一款「飭寨遊以定經制」、第二款「設標遊以備策應」及第三款「重要防以杜窺伺」，詳見下文討論。

在前述奏疏中，黃承玄提到更動海防部署的原因，謂：

臣惟各省海防，獨閩為最急；而各省武備，則獨閩為最弛。……福建海防，縈紆二千餘里；初設五寨，後添五遊，今複益其二，⁵¹ 制亦綦密矣。乃一遇小警，皇皇焉若不足恃者，何也？

他認為寨與遊兩者各有功能，「以寨為正兵，以遊為奇兵，寨屯於遊之內，遊巡於寨之中，蓋寨藉遊以共聲其援」，亦即寨（正兵）是防守所轄海域，遊（奇兵）是應援各地，後者角色如今所謂機動部隊或快速打擊部隊，此亦沿海設「遊」之原意。但是：

乃今日之事有大謬不然者，寨既漸移內灣，盡非建置之初，遊亦畫守疆隅，全失立名之義。且向止五寨，猶必合為二鯨；今加七遊，復各分為四哨。鯨零則氣弱，備多則力分。且散泊便於偷安，哨近易於影射，此皆近日之陋規也。

針對福建寨、遊部署的缺失與陋習，黃承玄在奏疏中提出兩項改革，由於〈福建海防圖〉中，有若干文字說明與其改革相當近似，亦附繫於相關條目；另外，為方便比較奏疏原文與該圖文字之異同，亦引用較多原文，且按地理位置，

⁴⁹ 黃承玄，〈題琉球咨報倭情疏〉，卷 1，頁 13b。

⁵⁰ 黃承玄，〈條議海防事宜疏〉，卷 2，頁 1a-20b。

⁵¹ 海壇、浯銅兩遊設立最早，其次是玄鍾遊（南澳遊），當時稱五寨三遊，到了 1590 年代初又設立嵩山、澎湖二遊，共為五遊。十七世紀初期先後增設臺山、湄洲二遊，即「今複益其二」之意。

由北往南敘述如下：

（一）重新釐訂寨、遊編制與轄區

1. 崙山遊分割為北路標船與礮山遊

原疏（指〈條議海防事宜疏〉）第一款載：

崙山僅烽火寨一哨，地又非極衝，而特設一遊，為烽火卸責，其制非宜也。請裁其十二船為北路標船，餘船改為礮山遊，兼哨馬砌、芙蓉等處，而設險均矣。

意即崙山原本僅由烽火寨一哨守防，後來改設一遊，黃承玄認為「其制非宜」，遂將其中 12 船改為北路參將直轄之標船，其餘船隻南移，另隸新設之礮山遊。礮山指四礮列島，位於今福建省霞浦縣東南方海上，在崙山島、臺山島之南，新設此遊主要是為守護福寧州。

〈福建海防圖〉在崙山之旁有一圖說，謂：

此山可容南北風船數十隻，原烽火寨左哨汛地。萬曆二十年改北路守備為參將，出汛屯劄於此；設名色遊兵把總，領大小戰船二十隻，專聽調度。擊右哨兵舡守三沙，以固福寧州門戶，其策頗是。但以一遊兵而防一哨信地，則設烽火寨何為？況此山極是衝要，比之臺、霜，猶為近地，一烽火把總劄守有餘，此崙山之所當議者也。

圖說亦指出「以一遊兵而防一哨信地，則設烽火寨何為」？語意與前疏之文頗類似，但未提及如何更動崙山遊的船隻配置。

2. 小埕寨改隸水路標遊

原疏第一款載：「小埕近連省城而遠隸北路，其事非便也，請改屬於標遊而節制易矣」。小埕即小埕寨，位在閩江口北側小埕澳，今屬連江縣筱埕鎮，其旁為定海所。此寨原本歸北路參將統轄，但因在閩江口外，可以守護福建省城，遂改歸「標遊」統領，所謂「標遊」即指黃承玄新設立的水標遊擊，關於此一標遊

的設立，將於下文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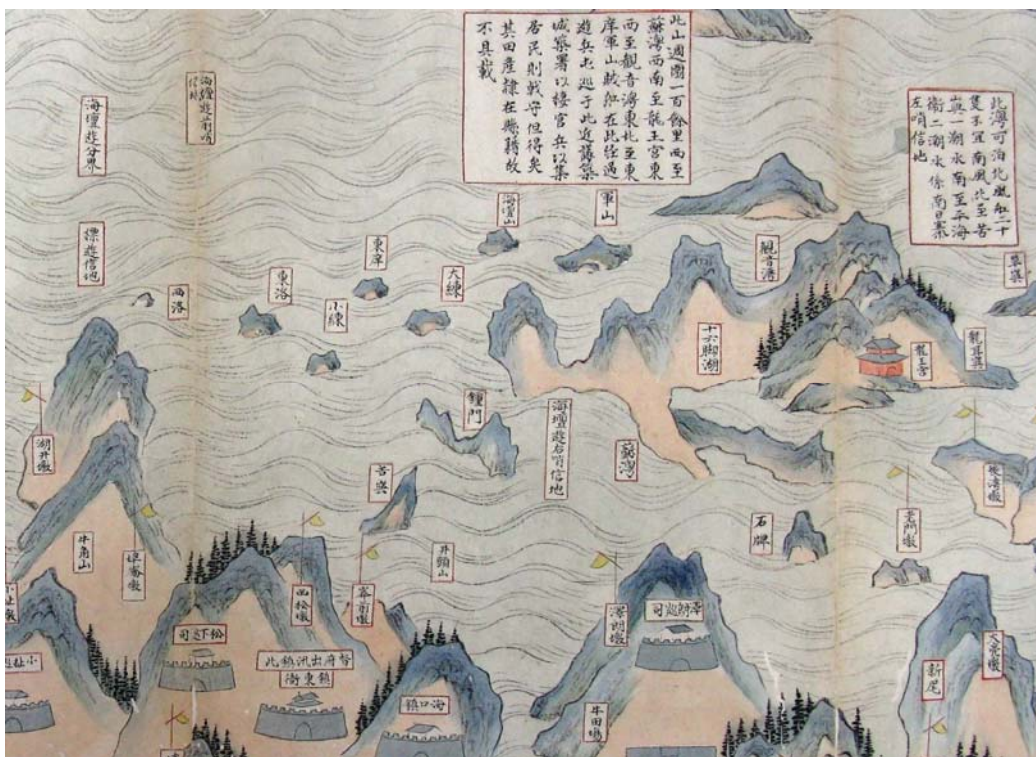
〈福建海防圖〉中僅標註小埕寨位置，並載：「本寨戰缸四十四隻」，並無其他文字說明。

3. 新設五虎遊

原疏第二款謂：

至於近日所復標遊十船，原非初制，不過量割臺山（指臺山遊）、⁵² 埕（指小埕寨）、南（指南日寨）之船，以為省城門戶計耳。……不如徑改為五虎遊，專責守廣石以外至五虎門一帶，亦付水標遊擊領之。

疏中所謂「近日」係指倭寇警報傳來後，黃承玄為防護省城門戶，特從臺山遊、小埕寨及南日寨抽調 10 艘船，稱之為「標遊」。而他撰寫此疏時，擬將標遊改為



圖五 〈福建海防圖〉海壇遊防區局部

⁵² 臺山指臺山列島，今屬福建省福鼎市。

五虎遊，隸屬水標遊擊統領。董應舉在崇禎年間撰寫〈閩海事宜〉，追記此事，謂：「即如閩中萬曆三十年間，初添五虎遊矣，續又添設水標」，⁵³即指此事，但年代應在萬曆四十年間。董應舉在〈漫言〉中亦謂：

省城門戶，以閩安鎮南出之琅崎門、東出之五虎雙龜門為兩喙，以梅花、定海為兩臂，以松下之東、西洛、礮山之西洋為兩關，以海壇、臺山為兩遊。……至於兩關，則東、西洛尤急，何也？賊，南賊也！來必徑此，舊屬五虎遊汛地。⁵⁴

此文論及閩江口外之海防情勢，其中提到東洛、西洛兩島為南方海賊入侵省城必經之地，⁵⁵舊屬五虎遊汛地。依據董應舉兩處文章所載，五虎遊確曾設立，而其時間應在黃承玄此疏之後。

在〈福建海防圖〉中，閩江口外繪出五虎山、五虎門，但未見標記「五虎遊」。不過，在西洛、東洛海域則有兩處文字標註，一處載「海壇遊分界」，另一處是「標遊信地」（參見圖五）。此處之標註文字值得注意，因為根據前述史料所載，西洛、東洛海域屬五虎遊汛地，而五虎遊前身是「標遊」，故可知圖中「標遊信地」之「標遊」，正是黃承玄疏中所謂的「近日所復標遊十船」，若此一看法無誤，則可推論〈福建海防圖〉描繪之海防部署乃黃承玄上疏時之寨遊狀態。

4. 重訂海壇遊的轄區與歸屬

原疏第一款載：

海壇遊亦南日寨一哨地。地非寥遠，而設以多船，守以欽總；且南日（寨）既哨苦嶼、蘇灣，而該遊駐劄鎮東，出守鹽埕、東庠之船不能越苦嶼而飛渡，又不能舍蘇灣以他泊，其設非均也。

⁵³ 董應舉，〈閩海事宜〉，收於董應舉，《崇相集》（東京：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会社，1993），頁142b。〔按：本文各處引用之《崇相集》乃據北京出版社的版本，惟此版本未收〈閩海事宜〉，故此處改引用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会社的版本〕。

⁵⁴ 董應舉，〈漫言〉，收於董應舉，《崇相集》，頁211-213。

⁵⁵ 閩江口外有兩處東、西洛島，一處在北側，屬連江縣，另一處在南側，屬今福建省長樂市。此文指南側之東、西洛島，又稱洛山列島。

合裁其十船為總鎮標船，責守東、西二洛，而并裁欽總，改設於浯銅；另立一名色把總管領其事。仍割南日之苦嶼改入海壇，就近汛守，而并聽節制於標遊。蓋海壇專蔽福清，南日全障興化，而守禦專矣。

海壇遊設立於隆慶年間（1567-1572）。⁵⁶ 奏疏謂南日寨負責巡哨苦嶼與蘇灣等信地，苦嶼在海壇島西北側，蘇灣則為海壇島西北側的港灣；而海壇遊駐泊於鎮東，船隻若出港前往海壇島的鹽埕與東庠島巡哨時，勢必經過苦嶼海域，亦即海壇遊船隻赴信地巡哨時，必須經過南日寨的防守海域，甚至在此海域之港灣（蘇灣）停泊。此種防區交錯的分畫似有不當，但這也是遊兵巡哨逐漸防區化的殘留現象，即海壇遊原是遊兵，未有信地守防，但在萬曆三、四十年代，海壇島海域劃為海壇遊信地，駐地卻由海壇島遷至鎮東，遂變成海壇遊出汛要跨越南日寨信地的現象。

黃承玄此次改革是將五寨、七遊均劃分防汛信地，故將臨近海壇遊駐地的苦嶼和蘇灣等海域改歸海壇遊巡哨，疏中所謂「海壇專蔽福清」，即海壇遊專責守護福清縣（鄰近福清灣）。同時裁減海壇遊的編制，將其中十船改為總鎮標船，即歸福建總兵直轄，⁵⁷ 至於縮編後的海壇遊則歸水標遊擊管轄。

〈福建海防圖〉中，在海壇島西北側苦嶼、蘇灣之間的海域註明「海壇遊右哨信地」，據黃承玄奏疏所述，即是海壇遊防區改變後的規畫。

5. 廢除湄洲遊

原疏第一款載：

湄洲遊亦係南日中汛地，前以一哨守之，不見其不足，今以一遊守之，不見其有餘。南日既上分苦嶼一哨歸海壇，則下有餘力，合徑裁去湄洲一遊，以十船協南日、海壇分哨信地，以餘船改為中路標船，內則分守三江門戶，外則周遊一路要衝，庶緩急得宜乎。

此段文字謂湄洲遊汛地原本由南日寨分派一哨（前哨）防守，今因南日寨苦嶼一

⁵⁶ 有關海壇遊駐地遷移的情形，可參看何孟興，〈海壇遊兵：一個明代閩海水師基地遷徙的觀察〉，《興大歷史學報》19（2007年11月），頁289-290。

⁵⁷ 總兵標船負責巡守東洛、西洛海域，此海域位於福建總兵出汛時駐守的鎮東衛外海。

哨改歸海壇遊巡守，本寨兵力有餘，可兼防湄洲遊之信地，遂裁去之。原湄洲遊以 10 船協守南日、海壇兩寨遊之信地，餘船改為中路標船，即歸中路遊擊直轄。

在〈福建海防圖〉中，於湄洲島之旁有兩條圖說與湄洲遊有關，一是在「湄州山」之旁註明：「原湄州兵舡在此守」，由於加一「原」，似乎湄州兵已不在此駐守。另一圖說謂：

按湄州原係南日後哨信地，其起在海上賊灣，為盜賊出入之區；又處南口〔按：應作日字〕、浯嶼之除（際？）。如地方失事，兩相諉推，此湄州道之所以設，即今標衝遊是也。週圍三十餘里，近居民耕種其間，亦不免流徙禱處，但南日稍近，兵舡絡繹巡邏，奸棍未敢肆行耳。

文中之「湄州道」應為湄洲遊之誤。圖說謂「即今標衝遊是也」，說明湄洲遊已改為「標衝遊」。另在圖中吉了巡司旁，寫有「東設眉州道，今改標衝遊」，「東」字應為「原」字之誤，眉洲道應為湄洲遊，由於湄洲遊之駐泊地在吉了，故於吉了的位置，又再標註原設湄洲遊，「今改標衝遊」，即與上述圖說描述相同。

由於三處圖說分別使用「今」、「原」二字，說明繪圖之時，湄洲遊方改制為標衝遊，而此一時機正與黃承玄奏疏所寫相符，可見〈福建海防圖〉與〈條議海防事宜疏〉兩者年代相近。又圖中之「今標衝遊」應指黃承玄疏中所謂的「中路標船」。

6. 新設浯澎遊

原疏第三款「重要防以杜窺伺」專論防守澎湖，其中亦涉及寨遊改革，謂：

今合以澎湖並隸浯銅，改為浯彭遊，請設欽依把總一員，專一面而兼統焉。浯銅原設二十二船，澎湖原設十六船，隣寨協守四船，今議再添造一十二船，增兵四百名，俱統之於欽總。而另設協總二人，一領二十舟，劄守澎湖，一領十二舟，往來巡哨。

此段文字謂合併澎湖、浯銅二遊，改稱浯澎遊，兩遊共有 42 艘船，黃承玄擬再添造 12 船，共有 54 船。至於「欽依把總」此一員額即從上述海壇遊移撥。據《明熹宗實錄》天啟元年 11 月 21 日（1622 年 1 月 2 日）條載：

新設福建泉南遊擊，裁浯彭遊欽總為名色把總，仍改浯彭遊為浯銅遊，從巡按御史鄭宗周之議也。先是閩海置將……南路駐漳州。泉郡陸兵有新、舊兩營，原額八百七十員名；水兵有浯嶼、浯彭、衝鋒三寨遊兵，船計七十九隻。緣未有專將，乃以水兵隸南路，陸兵隸中路，事體不便，至是始設遊擊于中左所，以兩營三寨隸之。⁵⁸

據此可知，浯銅遊曾改作浯澎遊，其時間應在黃承玄任巡撫之時，至天啟元年又改回浯銅遊舊制。⁵⁹

在〈福建海防圖〉中，今澎湖群島附近有一文字說明：「此係澎湖遊右哨信地，北風守蔴內，南風移泊風櫃仔。左哨北風守獅嶼頭，南風移泊大菓葉防守」。而中左所（今廈門）之西側註明：「浯銅遊」、「本遊大小戰舡二十二隻」。顯示澎湖、浯銅二遊尚未合併。

上述寨遊的合併、移編及信地轉移大致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分析，一是試圖騰挪船隻，以便在各路設置所謂的「標遊」。黃承玄在疏中謂：「寨遊統制疏密之宜尚有未盡善者」，但不論是崙山遊撤廢、小埕寨改隸、新設五虎遊、海壇遊分割、湄洲遊廢除等均與設立「標遊」有關，關於此點，下文會再討論。另一分析角度是澎湖防務的強化，依黃承玄的規畫，浯銅遊原有 22 艘船，澎湖遊原有 20 艘，再加新添一遊 12 艘，合計 54 艘，當時福建五寨各自船數四十餘艘，而新設的浯澎遊雖稱是「遊」，但水師實力比各寨強大。不過此事亦有脈絡可尋，1597 年澎湖遊初設，其後幾年巡防澎湖海域的船隻曾增至 58 艘，⁶⁰ 船數比浯澎遊還多，說明萬曆年間福建官方非常重視澎湖群島的守防事宜；另外，浯嶼寨駐地從廈門灣移至泉州灣的石湖後，廈門灣防務亦須加強，故此時期規劃設立一較為強大的浯澎遊，並提升把總的位階（欽依把總），亦屬合宜；數年後，1621 年更添設

⁵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黃彰健校勘，《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 16，頁 810-811，天啟元年 11 月 21 日條。

⁵⁹ 何孟興，〈明末浯澎遊兵的建立與廢除（1616-1621 年）〉，《興大人文學報》46（2011 年 3 月），頁 127-162。

⁶⁰ 曹學佺，《曹能始先生石倉全集》，第 21 冊：石倉文集·湘西紀行，下卷，頁 29a-29b 載：「惟戊戌春防，設左、右二總，合其兵船四十隻，益以各寨游遠哨兵船一十八隻，共計兵士三千餘名」，另參見何孟興，〈金門、澎湖孰重？：論明代福建泉州海防佈署重心之移轉（1368-1598 年）〉，《興大人文學報》44（2010 年 6 月），頁 197-198。

泉南遊擊，管理的位階更高。

〈福建海防圖〉的描繪與上述黃承玄奏疏中的改革相比，海防圖並未提及小埕寨改隸，標遊尚未改成五虎遊，而廈門至澎湖一帶海域尚分為澎湖遊與浯銅遊，未見新設的浯澎遊；但同樣議及崙山遊的存廢，至於海壇遊轄區的更動與湄洲遊的廢除在圖中均已描繪與註明。從上述現象來看，該圖描繪的年代與黃承玄前述奏疏寫作時間極為相近，亦應在 1616 年時，且略早於黃承玄上呈〈條議海防事宜疏〉。

（二）「設標遊以備策應」

在〈條議海防事宜疏〉八款條議中，有一條是「設標遊以備策應」。當時黃承玄面臨著福建海防部署的兩個問題，一是寨、遊的功能爭議，上文提到，寨被視為「正兵」，而遊則是「奇兵」，但福建省各地的「遊」卻逐步防區化，⁶¹同時代的官紳亦有類似的批評，如 1613 年（萬曆 41 年）序刊本《福州府志》編者即謂：「寨可以分疆言，遊難以汛地執」，即遊與寨不同，各遊不當執守汛地。⁶²黃承玄接任巡撫時，福建五寨之外，原設七遊各分信地，遊已失去遊巡、應援作用，因此他在奏疏中即提到官紳「議復寨遊舊制」。另一問題與前述問題相關，即倭船入寇的警報傳至福建，「各路將領動請增兵增船，顧多增則勢有不能，少增則於事無益」。由於兵與船無法驟然加增，黃承玄認為只有更動兵力配置，於是設立標船制度，以解決緩急所需。

標船的概念源自「標兵」，明朝的標兵起源於十六世紀中葉，當時防禦北邊蒙古的總督設置直屬部隊，稱之標兵，其後各省督撫、總兵仿效此制，隆慶年間福建巡撫、總兵亦設有標兵，標兵可稱是將領直轄的精銳部隊。⁶³

1592 年日本豐臣秀吉出征朝鮮，福建巡撫張汝濟為加強海防戰備，將原北路守備改為北路參將，並從部分寨遊抽調 18 艘船，作為參將標下戰船，⁶⁴朱梅等纂《福寧州志》載：「仍設中軍遊把總一名，領兵哨守往來，應援各處要害，故不

⁶¹ 何孟興，〈明末浯澎遊兵的建立與廢除（1616-1621 年）〉，頁 134-137。

⁶² 林材纂，《福州府志》，頁 178。

⁶³ 肖立軍，〈明代的標兵〉，《軍事歷史研究》1994: 2，頁 126-131。

⁶⁴ 不著撰人，《倭志》，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輯，《玄覽堂叢書·續集（第 4 冊）》（臺北：該館，1985），頁 628-629、658、663。

謂之寨，而謂之遊，萬曆二十年……改中軍遊為崙山遊」。⁶⁵此一中軍遊即屬標兵性質，隸北路參將標下。〈福建海防圖〉在崙山位置標註「萬曆二十年改北路守備為參將，出汛屯劄於此」，亦指此時新設之標船；黃承玄在前述奏疏中提到福建「原有北標左翼二遊」，或許與北路參將標船有關。1593年（萬曆21年）福建巡撫許孚遠奏請設立直屬福建總兵的兵船，亦似標船的概念，其文謂：

總兵雖駐鎮東調度，曾無專統兵船，故汛畢回劄省城，殊覺優游無事。……查得北路信地，自烽火、小埕直至海壇、南日，相距柒捌百里，脫有警急，調遣實難，大小將領亦以是紛紛多議。今莫若移總兵常駐鎮東，專設兵船壹艘，聽其督駕，而以海壇遊兵屬之，使得緩急自如，上下俱便。⁶⁶

許孚遠建議總兵常駐鎮東，專設兵船一艘，加上海壇遊兵歸其管轄。此議不知當時是否付諸執行，不過日後的發展，海壇遊仍舊畫有信地，似未歸總兵直轄。至於1597年時，「撫臣金學曾復題設應援一枝、為船四十、為兵三千」，此議似未施行。上述事例顯示先前幾任福建巡撫試圖在寨、遊之外，設立專屬的遊擊船隊，但似乎都限於議論或短暫施行。另外，1613年序刊本《福州府志》記載巡撫標下有6營，其中有「標前游、標左游」，總兵標下有3營，其中有「標前游、標右游」，⁶⁷此種遊營編制為450人，且未載額設船隻，較像陸營編制，而非水師。

到了1616年，福建巡撫黃承玄面臨倭寇警報，各路將領要求增兵、增船，他認為解決之道，就是設立標船制度，包含直屬巡撫的水標遊擊，總兵標船及北、中、南三路標船。分述如下：

1. 增設水標遊擊

原疏第二款謂：

惟是營寨相距每數百里而遙，其地各有專司，其力僅能自保。……莫如另設遊兵一枝，往來策應，使沿海常餘一遊之師，以待其急，而隨處得借一

⁶⁵ 朱梅等纂，《福寧州志》，頁82。

⁶⁶ 許孚遠，〈議處海防疏〉，卷6，頁3b-4a。

⁶⁷ 林材纂，《福州府志》，頁184-186。

遊之勢，以壯其援，此今日萬全之備也。

……但請增水兵千名、戰船二十四艘，畧倣洋遊之制，仍擊〔按：應為繫〕標遊之名。汛期則分遊南北，遍歷寨、遊；汛畢則收入南臺，時加操練。聞調即發，遇警即援合鯨而行……仍請於標下增設遊擊一員領之，以見在遊擊專管陸營，以新設遊擊專統舟師，而小埕、海壇二寨遊俱聽其節制……（五虎遊）亦付水標遊擊領之。

據黃承玄的規畫，設置水標遊擊，統領直轄的標遊與小埕寨、海壇遊、五虎遊，總船隻數可能超過百艘，巡防福建南、北，各地有警則即調應援。水標遊擊船隊的駐泊地擬設於南臺，南臺島位於福州府城南側閩江中，接近出海口。

同年（1616）稍後，黃承玄又上奏〈請補水標將領疏〉，謂：「冬防期迫，求將甚難……則眾口一詞，僉舉原任浯嶼寨把總、歷陞浙江溫區參將、今告病沈有容」。又提到水標遊擊統領的轄地與職責，如「議割北路之小埕寨、中路之海壇遊，就近改屬本遊」，且謂：

汛初則上遊北路，直抵南麂閩、浙之交，以遏敵衝；汛末則下遊南、中二路，直抵南澳閩、粵之交，以要歸寇。無事收操南臺，有警立發策應；全閩恃為緩急，各路藉之聲援。所至各寨、遊總哨官兵，仍皆聽其節制。⁶⁸

1619年葉向高在〈新建定海參將公署碑〉記載沈有容擔任水標遊擊時，謂：

時公署未設，寄居三山。踰歲而倭犯東沙，沈君計擒七十人。以浮言拂衣去，而黃公亦艱歸。代者為臨海王公……惟定海所為會省門戶，控浙、粵而處其中，於緩急策應便，乃議即所為署，而移所於西北隙地。……遂以萬曆戊午〔按：46年，1618年〕之孟冬鳩工，閱次年夏，告成事。⁶⁹

此文提及1617年東沙擒倭後，沈有容因浮言去職，繼任巡撫王士昌復聘入閩。沈有容以定海所地處省城門戶，亦為小埕寨駐地，遂在此設立公署。公署於1618年冬季興工，次年夏季完工。原本黃承玄規劃水標遊擊駐紮南臺，但最後公

⁶⁸ 黃承玄，〈請補水標將領疏〉，收於黃承玄，《盟鷗堂集》，卷2，頁20b-22a。

⁶⁹ 沈有容輯，《閩海贈言》，頁16-18。

署設於定海所，位於閩江口北側黃岐半島南端，屬連江縣轄。

在〈福建海防圖〉中，定海所旁僅標註「小埕寨」、「本寨戰缸四十四隻」，未見水標遊擊之描繪，顯示此圖繪製之時，尚未有水標遊擊的衙署。

2. 各路設標船

原疏第二款謂：

至於近日路將各有標船之請，亦以寨、遊咸有信地，徵調遽難應期，欲求增標下十二船，以便往來督率之用，此亦勢所不可少者。……宜就各寨、遊內裒而與之。

總鎮則取之海壇遊，北路則取之崙〔按：應作崙〕山遊，中路則取之湄洲遊，南路則取之銅山、浯嶼二寨、浯銅、南灣二遊。每路十二船，徑隸標下，聽其指揮。……

總之，在全省則三路提衡，而標下一遊〔按：指水標遊擊標船〕為應兵；在各路則寨、遊分地，而本標十二船為應兵。寇小入，則本路自以標船救之；大入，則臣〔按：指閩撫黃承玄〕以標遊赴之。

此文提到各路將領「有標船之請」，黃承玄遂就「各寨、遊內裒而與之」，此即上文所述福建某些遊裁撤、分割或縮編的原因。其中總兵標船取自海壇遊，北路參將標船取自崙山遊，中路遊擊標船取自湄洲遊，南路參將標船則抽調自銅山、浯嶼二寨以及浯銅、南澳二遊。

總之，黃承玄規劃的標船制度是設立水標遊擊，統領一寨三遊之兵船，遊巡福建全省海域；福建總兵轄下有標船 10 艘；北、中、南三路各有 12 艘船，由三路參將、遊擊統領，負責三路各自的救援。從福建海防史的角度來看，1616 年福建巡撫黃承玄在寨、遊等水師制度之外，全面性實施標船制度。

在〈福建海防圖〉中，未標註水標遊擊之官銜與公署，只見五虎門南方水域標註「標遊」、以及湄洲遊改為「標衝遊」。上文論及「標遊」是黃承玄在五虎門一帶新設置的標船 10 艘，他並將湄洲遊改為「標衝遊」；因此，圖中這兩處標遊、標衝遊的記載反映的是黃承玄在福建設立標船制度初始時期的現象，即五虎門一帶雖有標船，但尚未改制為五虎遊，但湄洲遊已改為中路遊擊直轄之「標衝

遊」。〈福建海防圖〉顯現的應為 1616 年福建海防的部署狀態。

（三）圖說與奏疏文字敘述的比較

黃承玄〈條議海防事宜疏〉寫於 1616 年日本村山等安派兵侵臺事件發生之際，筆者認為〈福建海防圖〉繪製時間與前述奏疏相近而略早。以下就圖與疏兩者某些文字敘述作比較：

1. 關於南麂的描述

黃承玄在〈題琉球諮報倭情疏〉中謂：

及查倭之入閩，必借徑取水於南麂，而後分鯨南發；西北風則徑指雞籠諸島，東北風則慮右突福寧，故南麂實上游之要衝。前撫臣金學曾曾請改設副總兵於此，如南澳故事；誠見及此也。⁷⁰

〈福建海防圖〉中南麂之圖說載：

倭來多從此取水，為要地。前議設副總兵屯駐，策應福、浙，經福建巡撫金題，未覆，亦以承平日久，事乃寢焉。

兩種文獻皆提及倭寇於南麂取水與福建巡撫金學曾提議設副總兵兩事。

2. 關於澎湖的描述

黃中丞在〈條議海防事宜疏〉中有專款討論澎湖的戰守事宜，文長八百餘字。〈福建海防圖〉亦有一圖說論澎湖，文長 251 字，上文業已引述，為便於討論，以下仍再全文引述，並與黃承玄之疏比較。〈福建海防圖〉載：

按澎湖環山而列者三十六島，蓋巨浸中一形勝也。山週圍四百餘里，其中可容千艘。我守之以制倭，倭據之以擾我，此必爭之地。

⁷⁰ 金學曾奏請改設副總兵之事，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 318，頁 5922-5923，其文謂：「兵部題稱閩浙接壤，勢同輔車，而兩省地利，南麂乃衝要之所，請將溫處參將改為副總兵，添設閩兵一枝，令統領汛守，無事照常會哨，有警併力夾攻，聽浙福撫鎮節制調遣，從閩金學曾議也，報可」。

前後建議，籌之詳矣。近因官兵遠涉，藉口風時不順，躲泊別處。或謂議當建城，又慮大費，遂寢其謀也。然要在將令得人，則兵不患其偷安，城之有無可毋論矣。

惟是延袤恢野，向來議守，委而棄之。既設遊屯兵防禦，可惜山地廣闊，若能開墾，則田有收，厚利有實。倘有賢能把守，募沿海漁民為兵守汛，畫地分疆，舊基興作，倡人開墾，三年之外，計畝量收其三分之一，行有成效，則置兵墾田，相資而食，共守險地，兩者俱得之矣。

此文分三段，分論澎湖形勢、籌防議論及建議置兵墾田。至於黃承玄奏疏之相關文字引述如下：

閩海中，絕島以數十計，而澎湖最大；設防諸島以十餘計，而彭島最險遠。其地內直漳、泉，外鄰東番；環山而列者三十六島，其中可容千艘，其口不得方舟。我據之，可以制倭；倭據之，亦得以制我：此兵法所謂「必爭之地」也。

往年平酋作難，有謀犯雞籠、淡水之耗，當事者始建議戍之，鎮以二遊、列以四十艘、屯以千六百餘兵；而今裁其大半矣。一旅偏師，窮荒遠戍：居常則內外遼絕，聲息不得相通；遇敵則眾寡莫支，救援不得相及。以故守其地者，往往畏途視之；後汛而往，先汛而歸。至有以風潮不順為辭，而偷泊別灣者；則有守之名、無守之實矣。……近有議設叅將以鎮守者，有議添設一遊互相救援者；臣以為皆不必也。澎湖之險，患在寡援。

……茲島故稱沃野，向者委而棄之，不無遺利之惜。今若令該總率舟師屯種其間，且耕且守；將數年以後，胥原有積倉之富，而三單無饑糧之虞：其便三也……。

黃承玄論澎湖戰守事宜，其大要亦是三重點，先論澎湖形勢，次論 1590 年代以來的戰守議論，末論澎湖改隸浯澎遊後的優點。澎湖圖說與黃承玄奏疏文字有三點近似。

1、關於澎湖形勢，圖說與奏疏均謂澎湖三十六島，可泊船千艘，且都表達「我守之以制倭，倭據之以擾我」的概念。

2、關於戰守事宜，奏疏文字較為詳細，但有一段文字雷同，即圖說載：「近因官兵遠涉，藉口風時不順，躲泊別處」，而奏疏載：「守其地者，往往畏途視之……至有以風潮不順為辭，而偷泊別灣者」。

3、最末一段，圖說載：「惟是延袤恢野，向來議守，委而棄之。既設遊屯兵防禦，可惜山地廣闊，若能開墾，則田有收……」，奏疏亦謂：「茲島故稱沃野，向者委而棄之，不無遺利之惜。今若令該總率舟師屯種其間，且耕且守」。

故圖說與奏疏中有關澎湖的描述，其寫作格式相同，部分文字雷同。

綜上所述，〈福建海防圖〉與黃承玄奏疏相比，有關南甌與澎湖的敘事均有部分雷同的現象，這是巧合，還是另有原因？明清時期之著作常見彼此內容雷同，即後出者抄襲前人，有時註明出處，有時則否，如嘉靖以來某些海防著作述及南甌、澎湖，亦會抄襲前人文字。若兩者年代相近，則可能作者彼此熟識，故能分享類似訊息。依據上文討論，〈福建海防圖〉繪製年代必在 1610 年以後，其下限則在 1616 年之前，因澎湖遊尚未併入浯澎遊，福建沿海亦尚未設立水標及三路標遊。而在這六年間，最可能的繪製時間是在 1616 年日本村山等安派船征臺消息傳抵福建之後。因此，該圖與黃承玄奏疏有部分雷同的現象，似可作為上述論斷之旁證。

四、時代背景：〈福建海防圖〉的海市描繪

明朝有關海防或海外番國著作的撰述時機往往與沿海大規模動亂有關，如十六世紀中葉嘉靖倭亂爆發後，主持平倭的胡宗憲聘鄭若曾編寫《籌海圖編》，又如 1592 年日本出兵朝鮮，總督兩廣軍務的蕭彥命鄧鐘編輯《籌海重編》。這類著作皆為平亂而多方搜集資料、情報，雖常見抄錄前人文字，但亦收錄當時的文獻與見聞，頗具參考價值。〈福建海防圖〉是因防倭而編繪的著作，但也如上述著作一樣，反映了繪圖之時的某些時代特色。

在明朝海防地圖中，〈福建海防圖〉的特點是畫出與福建一海之隔的島嶼群，即從琉球（那霸島）、臺灣到呂宋島。雖然臺灣島畫成一連串的島嶼，但圖

中註記的地名，從「鷄籠」至「沙馬頭」，共有 20 個，⁷¹ 相較 1603 年陳第（1541-1617）〈東番記〉僅記載 10 個地名，顯示〈福建海防圖〉繪製時福建官紳對臺灣的地理認知較陳第時期更進一步。為何此一時期要如此描繪「閩海」？即為何在一幅福建海防圖裡，要繪出遠洋一連串的島嶼，從琉球至呂宋？此又與防倭有何關係？

（一）福建官紳描繪的閩海情勢

1616 年琉球國遣使至福建，通報倭寇侵犯的消息，巡撫黃承玄接獲巡視海道副使韓仲雍的報告後，即命「沿海各道路將、海防、備總等官嚴督哨兵遠出偵探，分布要害，加謹隄備」。⁷² 韓仲雍遂派遣董伯起前往東湧偵探，而有隔年日本送回董伯起的事件。⁷³ 由於「閩患不可測」，黃承玄隨即提出前引之〈條議海防事宜疏〉，疏中特別強調各款條議是他依據分巡福寧道黃琮、糧餉道畢懋良、巡海道韓仲雍等屬官提出的建議，加上自己多方採訪；換言之，黃承玄對海上事務的看法與福建寨遊的更動，是根據部屬的看法與自己的採訪，因此，其奏疏反映了 1616 年前後福建官紳對閩海的認知。以下引述黃承玄〈題琉球咨報倭情疏〉有關閩海情勢的描述，由於此疏引用多位官員的報告，可與〈福建海防圖〉之描繪比較，藉以瞭解該圖的描繪方式。

1、北路參將劉思祖稟報琉球國通事官蔡廩稱：

彼國有日本七島夷人來說，各島見在造船，欲收小琉球。彼國王慮風色不常、流突中國，令其先行馳報。

2、琉球國中山王尚寧咨稱：

邇聞倭寇造戰船五百餘隻，本年三月內協取雞籠山等處。竊思雞籠山雖是

⁷¹ 關於這些地名的討論，筆者擬另文處理，惟筆者曾於 2014 年 10 月 22 日以〈十七世紀初臺灣海峽兩岸情勢分析：以東番記、福建海防圖為例〉為題，在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演講，對前述問題有所討論，另可參見周運中，〈明代《福建海防圖》臺灣地名考〉，收於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編，《國家航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 13 輯，頁 157-174。

⁷² 黃承玄，〈題琉球咨報倭情疏〉，卷 1，頁 14a。

⁷³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頁 158-159。

外島野夷，其咽喉門戶有關閩海居地。

3、泉州府海防官呈報：

紅毛番有大船六隻、小船十隻于正月十六等日來到呂宋，攔把港口，候打洋船貨物。幸呂宋國王討船與洋商林懷貴等先回報知，各商不得再往。

4、銅山寨把總汪伯泓報稱：

三月十七日督兵於廣東赤澳遇三賊船，攻沉斬級獲賊，擄盧十二等合夥往販日本啣野沙機、長旗港等處；又稱琉球降伏，日本倭王造船二十餘隻，挑選倭眾奪占東番山，意在互市等情。

5、海道副使韓仲雍謂：

看得倭號鷓鴣，而其洲嶼地脉陰相聯亘于鯨波蛟宮之中，……南則歷薩摩、博多，度大琉球國……而近年已折入于倭。……稍南則雞籠、淡水，俗呼小琉球焉，去我臺、礮、東湧等地，不過數更水程。又南為東番諸山，益與我澎湖相望。此其人皆盛聚落而無君長，習鏢弩而少舟楫。

6、海道副使韓仲雍又謂：

本道治兵泉州，曾結正私度東番捕採葉德等一獄，而因知倭有烏尾數船，時時收買鹿獐、錦魴等皮于番中。及領海道，又斥絕妄援三十八、九年例，請添給淡水洋引之陳文陽輩，而益疑閩有奸民，必將勾引倭奴接濟貿易于此港。今果見萌兆矣。

7、福建巡撫黃承玄謂：

夫倭豈真有利於雞籠哉，其地荒落，其人鹿豕，夫寧有子女、玉帛可中倭之欲也者，而顧眈眈伺之也？……今雞籠實逼我東鄙，距汛地僅數更水程。倭若得此而益旁收東番諸山以固其巢穴。⁷⁴

⁷⁴ 黃承玄，〈題琉球咨報倭情疏〉，卷1，頁12a-17b。

上述七項大致可歸納為三個重點：

1、遠洋島嶼形勢：從日本到臺灣海域，有一連串的島嶼相連，即韓仲雍所謂從日本的薩摩、博多，到大琉球國，到雞籠、淡水，再往南到東番諸山，「洲嶼地脉陰相聯亘于鯨波鯨宮之中」。

2、臺灣海域的住民：「盛聚落而無君長，習鏢弩而少舟楫」、「其地荒落，其人鹿豕」，意即這些住民的生活狀態相當原始，只是「外島野夷」，對明朝並無威脅。

3、海寇動態；福建人在東番購買鹿皮，與倭寇勾引、接濟，相互貿易。另外，紅毛番船隊至呂宋，攔把港口，此即指十七世紀初期荷蘭東印度公司為擾亂馬尼拉對外貿易，不斷派船在菲律賓海域攔劫西班牙與唐人船隻。⁷⁵

上述三點呈現了 1616 年時福建官紳對於閩海情勢的看法，筆者認為〈福建海防圖〉的繪者將琉球至呂宋海域描寫為一連串的島嶼，即是海道副使韓仲雍所謂「洲嶼地脉陰相聯亘」。至於該圖中介於福建與臺灣之間的島嶼，亦如前引韓仲雍所謂：

迤南而為臺山、為礮山、為東湧、為烏坵、為澎湖、為彭山，皆是我閩門庭之內，豈容汝〔按：指倭寇〕涉一跡！此外溟渤，華夷所共。⁷⁶

因此，藉由明朝福建官員如黃承玄、韓仲雍對於閩海情勢的描述，我們可以了解〈福建海防圖〉的描繪方式，即區分遠方島嶼、近海島嶼及近岸島嶼等類別的意涵：福建遠洋有一連串島嶼，那是島夷所居，對明朝無威脅，但有倭寇、福建人（唐人）及紅毛番活動、交易，甚至劫掠。至於近海島嶼如南麂、臺山、礮山，以至澎湖、南澳，則是哨防之重點，寨、遊兵船巡邏之最前線。在這一防線中，守禦閩、浙之交的南麂，可遏止南下之倭敵；哨防閩、粵之交的南澳，能攻擊回歸日本之倭船。圖下方福建沿岸，則由總兵、各路參將、遊擊、分守道、衛所、寨遊、巡檢司構成福建全省防倭的武備體系。

162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據澎湖，福建官方要求荷蘭人退出，雙方在福州會談後，當時福建巡撫商周祚在奏疏中謂：

⁷⁵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頁 189-192。

⁷⁶ 黃承玄，〈題報倭船疏〉，卷 2，頁 33b。

諭令速離澎湖，揚帆歸國，如彼必以候信為辭，亦須退出海外別港以候，但不係我汛守之地，聽其擇便拋泊。惟嚴防要害，內固吾圍，……如彼奉約無擾，我但治以不治。⁷⁷

商周祚的海防概念亦與黃承玄時期相同，即澎湖是汛守之地，因此，十七世紀初荷蘭人兩度被迫離開澎湖，但福建官方認為「海外別港」則可任由荷蘭船隻「擇便拋泊」。此處「海外別港」即指〈福建海防圖〉中遠方島嶼群的港口。

（二）「東番諸山」的隱喻

十六世紀中葉以來，明朝官紳繪製的海防圖如《籌海圖編》之〈福建沿海山沙圖〉、《虔臺倭纂》之〈萬里海圖〉，其有關福建的描繪重點都在福建沿岸，「澎湖山」、「東湧」僅繪於畫框邊緣，⁷⁸但〈福建海防圖〉則畫出臺灣海域諸島，上文提及此種畫法反映的是 1610 年代福建官紳對於閩海情勢的看法，但為何福建官紳此時期會注意到臺灣海域諸島？甚至在海防圖中著力描繪，其原因是倭寇與福建人在彼接濟、貿易，但更重要的原因應是「窮洋竟同鬧市」。

「窮洋竟同鬧市」一語出自 1629 年（崇禎 2 年）浙江巡撫張延登之題本，他認為浙江當地奸民皆假冒鄉紳旗號，以船裝載酒、米賣給漁船之人，進而「藏違禁硝磺等物以資賊，每獲重利而歸，窮洋竟同鬧市」。⁷⁹此一概念亦可用來形容十七世紀初期的閩海情勢，當時福建官紳注意到東番諸山，不僅是福建官紳有關海洋知識持續增長的結果，亦是東番諸山某種情勢吸引了福建官紳的注意力，遂筆之於奏疏，繪之於輿圖。

1617 年村山等安為送還董伯起，命明石道友率船至福建，海道副使韓仲雍與之對談，黃承玄〈題報倭船疏〉記載此事，疏中有幾段描述值得注意：

韓仲雍問明石道友何故侵擾雞籠、淡水？明石答覆：

⁷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黃彰健校勘，《明熹宗實錄》，卷 30，頁 1536-1537，天啟 3 年 1 月 24 日條。

⁷⁸ 謝杰撰，《虔臺倭纂》，頁 138-145。

⁷⁹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鄭氏史料初編》（文叢第 157 種，1962），兵科抄出浙江巡撫張延登題本，頁 15。

自平酋物故以來，國人亦甚厭兵守分。惟常年發遣十數船眾，挾帶貨本通販呂宋、西洋諸國；而經過雞籠巖頭，頻有遭風破船之患。番人恃其鏢弩，不相救援，反血刃我人而掠我財；故乘便欲報舊怨，非有隔遠吞佔之志也。

又問為何謀據北港？明石答覆：

即係常年通販，船經由彼地，駐泊收買鹿皮等物則有之，竝無登山久住意。或是漁捕唐人，見影妄猜；或是讐忌別島，生端唆害。⁸⁰

韓仲雍在會談最後稱：

每歲引販呂宋者一十六船，此等唐貨豈盡呂宋小夷自買而自用之乎！又各遠嶼窮棍，挾微貲、涉大洋，走死驚利於汝地者，弘網濶目，尚未盡絕。而汝若一旦戀住東番，則我寸板不許下海、寸絲難望過番，兵交之利鈍未分，市販之得喪可觀矣！⁸¹

在這些對談中，明石道友提到日本船每年會到東南亞（呂宋、西洋諸國）貿易，亦會到臺灣（北港）收買鹿皮，而韓仲雍則提到窮棍挾貲涉洋，加上前述黃承玄奏疏所言紅毛夷劫奪洋船；換言之，即日本船隻沿著琉球、臺灣諸島南下貿易；而福建人則越洋前往東番諸山交易，甚至在彼居住，成為「遠嶼窮棍」；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紅毛番）搶奪往來呂宋之商船。這些描述加總起來，在琉球、臺灣、呂宋這些島嶼群間，已有日本商人、福建商人、荷蘭東印度公司、西班牙王國等多股勢力，彼此交易或對峙，關於此一現象之研究已多，可參看相關學者的研究，本文不贅述。⁸²

⁸⁰ 黃承玄，〈題報倭船疏〉，卷2，頁31a-31b。

⁸¹ 黃承玄，〈題報倭船疏〉，卷2，頁34b。

⁸² 相關著作甚多，日文方面如岩生成一，〈續南洋日本町の研究：南洋島嶼地域分散日本人移民の生活と活動〉（東京：岩波書店，1987），頁281-302；中島樂章編，〈南蠻・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京都：思文閣出版，2013）。中文方面有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范金民，〈販番販到死方休：明代後期（1567-1644年）的通番案〉，《東吳歷史學報》18（2007年12月），頁75-112。

因此，如何看待〈福建海防圖〉裡琉球、臺灣到呂宋海域出現的島嶼群與地名？這些島嶼群的描繪並不符合實際島嶼形狀、大小比例，以臺灣海域島嶼為例，臺灣島被畫成很多島相連，此即黃承玄奏疏中所稱的「東番諸山」，何以東番有很多「山（島）」？筆者認為這可能是福建漁民、海商橫渡於臺灣海峽之間，從福建的某些港口對渡臺灣島的某些港口，缺乏對整體臺灣島的認識。〈福建海防圖〉中臺灣海域島嶼群標註 20 個地名，此亦與上述臺灣多島概念有關。臺灣海域地名共有：「鷄籠、鷄籠港、淡水、芝巴山里、新港、崩山、牛山、三林、二林、灣頭、小漁嶼、北港、大線頭、魷港、馬沙港、加老灣、小溪水、小溪水、茭丁港、沙馬頭」等，二十個地名裡共有 16 個與「港」、「水」、「山」、「頭」有關，⁸³ 這些均是福建航海者的慣用語，顯示這些地點的命名是受到航海者的影響。在那個時代，每個福建航海者出入的港口都可能被想像為一個島，這應是「東番諸山」概念的成因。

福建漁民、海商會前往這些地點，除了與原住民交易外，更重要的是與日本商人交易。於是，東番原是福建人認為的窮洋，至 1610 年代如同鬧市矣。至於 1610 年代一幅〈福建海防圖〉為何標註臺灣海域有 20 個地名，出現於一連串的島群中？這應不是出於科學興趣的探勘或海防武備的關注而已，而是先前認為的窮洋，已成唐人、倭寇交易的鬧市，上述地名即商周祚所說的「海外別港」。

五、結論

〈福建海防圖〉一如明朝其他的海防圖，註記很多的地名、官署名以及圖說，呈現某一時期福建的海防部署與武備體系；但在明朝的海防圖裡，該圖是幅很特殊的地圖，繪者關注的焦點是離福建海岸較遠之島嶼，如南甌山、東湧、澎湖等，還有更遠的島嶼群，包含琉球、臺灣、呂宋等。

本文分析〈福建海防圖〉的內容，並著重討論繪製年代，依據圖中浯嶼寨移駐石湖、南日寨移駐劉澳等現象，認為此圖繪製於 1610 年以後，又因澎湖遊尚未併入浯澎遊，福建水標遊擊亦尚未設立，故其下限在 1616 年。根據此圖標註

⁸³ 鷄籠應是鷄籠山的省稱，亦應計入，則總計有 17 個地名，僅芝巴山里、三林、二林與原住民語有關。

「標遊」、湄洲遊改為「標衝遊」等跡象以及圖說文字與黃承玄 1616 年前後奏疏之比較，本文認為此圖最可能的繪製時間是在 1616 年福建倭警頻傳之時，亦即村山等安派船出征高砂國的傳聞迫使福建官方加強沿海守備，可能是繪製此圖的原因與時機，因此，圖說文字主要為外島戰守之議論。

依據上述討論，〈福建海防圖〉與黃承玄的奏疏有著相同的知識來源，即當時福建官紳對海防的議論與閩海情勢的認知。這種地理認知使用「門庭」、「藩籬」等概念，認為福建沿海易遭倭寇，而近海的島嶼如南麂、嵵山、臺山……及澎湖、南澳等，構成了福建的門庭與藩籬；而在這些島嶼之外，存在著野夷所居、倭寇潛藏的一連串島嶼群，起自日本，經琉球、臺灣（東番諸山），延伸至呂宋島。筆者認為〈福建海防圖〉的描繪呈現了福建官員對於前述閩海情勢的認知，而此種描繪極富時代意義，僅以臺灣海域多島的描繪與註記二十個地名為例，不僅形象地呈現「東番諸山」的概念，亦隱喻著「海外別港」、「窮洋竟同鬧市」的想法，傳達出各地海商在前述島嶼群活動的訊息。

就臺灣海域而言，十七世紀初福建將領沈有容率船攻打大員之倭寇、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來到澎湖、日本德川家康命有馬晴信至臺灣探察，到了 1610 年代，村山等安派船來臺灣、西班牙傳教士 Bartolomé Martínez 建議菲律賓總督佔領臺灣，這些歷史事件的背後，均是因日本商人、福建商人在臺灣島沿岸交易。1610 年代臺灣島西岸港澳之海市業已形成，雖然整體貿易規模有限，但已能吸引荷蘭東印度公司、西班牙王國至此一海域，導致 1620 年代上述兩股勢力先後佔據臺灣島的大員港、雞籠港，以及後續各股勢力間的紛爭。對明朝福建官方來說，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一直有倭患，為何會在十七世紀初期繪出臺灣等島？亦是因十七世紀初期 20 年間，日本、呂宋、澳門、福建之間的貿易日益熱絡，臺灣島西岸正處於各股商業勢力往來路經之地，特別是福建商人、漁民往來閩、臺之間，對福建人而言，「東番諸山」實乃東番諸港之意也。因此，〈福建海防圖〉的重要性，不僅是記錄了 1610 年代福建的海防部署，亦從福建官紳的角度，顯露了當時代臺灣周遭海域的商業與地緣政治情勢。

引用書目

- 許孚遠，〈議處海防疏〉，收於許孚遠，《敬和堂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 22 年[1594]序刊本。
- 不著撰人
1985 《倭志》，收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輯，《玄覽堂叢書·續集（第 4 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黃彰健（校勘）
1966 《明熹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4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中村孝志（著）、許賢瑤（譯）
2001 〈關於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碑〉，收於村上直次郎等著、許賢瑤譯，《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頁 187-203。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 中島樂章（編）
2013 《南蛮、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京都：思文閣出版。
- 方 豪
1994 《臺灣早期史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王世懋
1975 《閩部疏》。臺北：成文出版社。
- 朱 梅等（纂）
1990 《福寧州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 何孟興
2006 《浯嶼水寨：一個明代閩海水師重鎮的觀察》。臺北：蘭臺出版社。
2007 〈海壇遊兵：一個明代閩海水師基地遷徙的觀察〉，《興大歷史學報》19: 279-307。
2010 〈金門、澎湖孰重？：論明代福建泉州海防佈署重心之移轉（1368-1598 年）〉，《興大人文學報》44: 179-206。
2011 〈明末浯澎遊兵的建立與廢除（1616-1621 年）〉，《興大人文學報》46: 127-162。
2011 〈論明萬曆澎湖裁軍和「沈有容退荷事件」之關係〉，《臺灣文獻》62(3): 125-148。
2012 《海中孤軍：明代澎湖兵防研究論文集》。澎湖：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 何喬遠（編撰），廈門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閩書》校點組（校點）
1994-1995 《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宋若霖等（纂）、宮兆麟（修）
1968 《莆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 汪 楫（編）
1984 《崇禎長編》，收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黃彰健校勘，《明實錄》，附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沈有容(輯)

1959[1602] 《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第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肖立軍

1994 〈明代的標兵〉，《軍事歷史研究》1994(2): 126-131。

周凱

1961[1832] 《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9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婉窈

2007 〈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臺大歷史學報》40: 93-148。

周運中

2015 〈明代《福建海防圖》臺灣地名考〉，收於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編，《國家航海》，第13輯，頁157-1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岩生成一

1987 《續南洋日本町の研究：南洋島嶼地域分散日本人移民の生活と活動》。東京：岩波書店。

林天人(編撰)

2013 《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林材(纂)

1992 《福州府志》。北京：中國書店。

林偉盛

1999 〈荷蘭人據澎湖始末(1622-1624)〉，《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6: 1-45。

姜勇、孫靖國

2011 〈〈福建海防圖〉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1): 67-72、158-159。

范涑

1997 《兩浙海防類考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范金民

2007 〈販番販到死方休：明代後期(1567-1644年)的通番案〉，《東吳歷史學報》18: 75-112。

唐大和(纂)

1988 《興化府志》。東京：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会社。

徐敏學、吳維新(纂)

1987 《萬曆重修泉州府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孫靖國

2012 《輿圖指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屠本仁(纂)

2001 《嘉興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

曹婉如等(編)

1995 《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

曹學佺

1993 《曹能始先生石倉全集》，第21冊：石倉文集·湘西紀行，下卷。東京：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会社。

陳宗仁

- 2003 〈「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21(2): 249-278。
- 2005 〈1622年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東亞貿易策略的轉變：兼論荷蘭文獻中的 Lamang 傳聞〉，《臺大歷史學報》35: 283-308。
- 2005 《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10 〈明朝文獻中「雞籠」與「淡水」地名的出現及其背景：兼論十六世紀下半葉北臺海域情勢的轉變〉，收於劉石吉、王儀君、林慶勳主編，《海洋文化論集》，頁 225-254。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閔夢得（修）

- 2012 《萬曆癸丑漳州府志》。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黃中青

- 2001 《明代海防的水寨與遊兵：浙閩粵沿海島嶼防衛的建置與解體》。宜蘭：學書獎助基金。

黃承玄

- 1991 《盟鷗堂集》。東京：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会社。

楊彥杰

- 2000 《荷據時代臺灣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應舉

- 1993 《崇相集》。東京：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会社。
- 2000 《崇相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 1962 《鄭氏史料初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5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鄭若曾（撰）

- 1983 《鄭開陽雜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

- 2007 《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

鄭若曾（撰）、鄧鐘（重輯）

- 1996 《籌海重編》。臺南：莊嚴出版社。

謝 杰（撰）

- 1958 《虔臺倭纂》。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懷蔭布（修）、黃任等（纂）

- 1964 《泉州府誌》。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

Drawing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Fujian Coastal Defense Map” of Late Ming Dynasty

Tsung-jen Chen

ABSTRACT

In 2012, a late-Ming military map was partially reprinted in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antique maps collected in the Librar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輿圖指要”. This large map depicts the waters around Fujian and Ryukyu, Taiwan as well as Luzon as outlying islands. Despite little attention by contemporary historians, the map is actually a rare and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 that demonstrates knowledge of Fujian officials on the maritime geography in the early seventeen century.

To explore the map-making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s study examined issues regarding when the map was drawn, who drew it, and what was depicted including harbors, forts, bays and offshore islands. Analyzing the ge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s and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map indicated that it was made around 1616 A.D. by officials or related personnel of Fujian government in response to frequent attacks by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coastal region. Moreover, the map portrayed vividly the ideas of Fujian officials on coastal defense, as well as their knowledge of offshore topography and pirate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islands. In addition, the depiction on the map not only revealed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coastal region but also shed light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Fujian waters in the 1610s.

Keywords: Coastal Defense, Fujian Navy, Governor of Fujian, Map of Taiwan, Japanese Pirates